

巨额财政赤字拖累日本经济

本报记者 苏海河

11月10日，岸田文雄在日本国会众议院首相指名选举中当选日本第101任首相。在其上个月的演说中，岸田表示将把施政重心放在解决国内事务上，处理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经济民生等重大问题。当前日本政府财政已债台高筑。岸田虽然多次强调财政纪律的重要性，然而，目前外界尚看不到岸田如何找到解决巨大财政赤字的良策。

3月底结束的2020财年度，日本财政支出总额为175.7万亿日元，但财政收入严重不足，当年发行国债总额约112.6万亿日元，60%的财政支出靠发债运营，且单年度发行国债额首次突破100万亿日元，使财政对国债的依赖度进一步提升。截至2020年底，日本中央政府与地方合计债务总额达1200万亿日元，平均每个国民身背960万日元国债。如果以民间企业的会计审计制度对日本财政进行审查，则日本政府已大大超过破产标准。同时日本央行2013年开始的负利率政策非但未能达到通胀率2%的目标，反而给日本金融市场埋下不稳定的祸根。

举债度日由来已久

将2020年与1990年进行比较，可知日本财政恶化的严峻程度。1990年日本年初预算额66.2万亿日元，收入主要靠税收和公共事业的建设国债。到了2020年初预算额102.7万亿日元，仅仅依靠税收和建设国债难以弥补财政支出，因此不得不发行赤字国债。

日本财政负担增加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随着社会老龄化，养老金、医疗保险、护理保险支出大大增加，社保费用支出从11.6万亿日元增至35.9万亿日元，社保负担在财政支出中的占比越来越大。二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政府为刺激经济，年年制定补充预算向企业、地方政府等发放各种名目的补助金，之后阪神大地震、国际金融危机、福岛东日本大地震连续不断，使临时性补充预算成为常态，导致赤字国债有增无减。三是安倍政权以来，为提高日本市场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连续削减企业法人税，使法人税率从2015年的32.11%下调至29.97%，再加上大企业享受的技术开发减税、设备投资减税、员工加薪税制优惠等措施，许多大企业的法人税实际税率更低，与美国的25.77%甚至与英国的20%税率相近。期间虽然政府将消费税由5%提升至10%，但财政上不敷出形势更加严峻。日本媒体戏称，国家财政收支成了“鳄鱼嘴”，口子越开越大，健全财政越来越困难。

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日本的财政赤字在西方各国中也远远“领先”。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20年西方主要国家的债务与GDP相比，日本达到266.2%，居世界之最，远远高于美国131.2%、法国118.7%、英国108%、德国73%的水平。



财政平衡有目标无行动

2020年以来，为应对疫情，日本政府三次增加紧急对策是国债陡增的主要原因。同时多年来滚雪球似的累积债务的利息负担也要靠国债维持，更使日本财政雪上加霜。面对长期巨额财政赤字，国际经济组织及日本经济界、学术界都指出了其不可持续性，日本政府也多次立下“雄心壮志”，要努力消除赤字实现基础财政平衡。

2002年，日本政府曾提出到2010年代初实现国家和地方财政略有盈余。该目标实现无望后，安倍政府又提出到2025年实现基础财政基本平衡，目前日本政府虽未放弃这一目标，但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不过是再玩一次“画饼充饥”的游戏。根据今年1月日本政府的“中长期经济财政预测”，如果日本名义GDP维持3%，实际GDP维持2%的增长，预测2029年日本将实现财政黑字。但现实是潜在增长率不足1%，日本政府显然高估了未来的经济增长率。

日本庆英大学教授金子胜认为，在安倍政权、菅义伟政权政策失败、执政无能的背景下，突发新冠肺炎疫情使日本经济雪上加霜。金子胜认为从经济学而言，短期赤字财政和量化宽松政策应该是为推动结构改革赢得时间的“麻醉剂”，但在安倍政权下结构改革毫无进展，日本经济长时间陷入“麻醉中毒症”。日本曾经辉煌的大型计算机、半导体显示器、生物医药、光伏太阳能、数字通信机械、锂电池等世界领先产业，如今已退化为无影无踪。

日本央行隐藏危机

央行的主要职责是制定金融政策并管理民间和地方金融机构，但日本央行为配合政府的经济政策过多地介入了国家经济活动。截至2020年底，日本央行保有资产702万亿日元，比一年前增加129万亿日元，这是自1998年央行公布资产以来最大涨幅，虽然央行的这种金融操作有利于企业周转金和维护就业，但同时也为下一轮经济泡沫埋下了重大隐患。

纵观日本央行的资产分布，国债535万亿日元，出借111万亿日元，持有股市信托基金35万亿日元，不动产投资基金6500亿日元，企业债6万亿日元，社会债券4亿日元。增幅最

多的分别是出借资金、企业债、股市信托等。日本央行以维护金融稳定为名，将收购股市信托资金的规模从每年6万亿日元扩大至12万亿日元，使日本央行持有的此类基金账面金额达35万亿日元，日本央行注资激活了股票市场，在经济危机中反而使日经指数一度达到3万点，目前维持在2.91万点的水平。日本经济学家描述为“实体经济惨不忍睹，股票市场却梦幻似锦”。央行超过“股市巨兽”养老金基金，成为日本市场上最大股东，控制的股市价格达45万亿日元。

疫情以来，日本央行为向企业提供充足周转金和稳定就业市场，向城市商业银行和地方银行提供大量无息拆借款，此类出借达62.74万亿日元，比一年前增加2.3倍。为向国家财政注资，日本央行大量收购政府国债，其持有国债总额达535万亿日元，特别是疫情以来，政府发行的短期国债主要流入日本央行，使央行的短期国债持有额从一年前的9.32万亿日元猛增至41万亿日元。其结果是日本央行购得政府发行的国债将近50%，呈现出毫无对策的财政危机局面，日本政府债务节节攀升，达到相当于GDP的266%，在正常经济理论下，已经处于破产边缘。中国及多数西方国家以能源转换为突破口，在促进信息通信技术发展的同时，彻底改变产业结构，赢得了发展先机，但日本却延缓了真正促进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调整。

日本央行的资产规模达到GDP的1.37倍，明显高于欧美国家的水平。日本媒体称，日本央行既是政策制定者，又是市场参与者，将使市场更加扭曲。

日本央行的此种政策措施带来多重风险，一是在西方国家中，日本央行是唯一购买股市信托基金的中央银行，增加了

资产风险。二是日本央行大量持有国债，在负利率政策下尚可维持，但在经济回升、基准利率增加后，日本央行将面临严重的利息负担。特别是央行托市后的股票市场将可能进一步趋热，不排除引发新一轮危机的可能性。

自从2016年1月实施负利率政策以来，国债到期后都存在结构性潜在损失，等到日本央行持有的国债全部到期时，其资产平衡表中长期国债的账面价格为494万亿日元，但实际价格仅为481万亿日元，意味着出现13万亿日元的亏损（按2021年1月持有的国债计算）。此外，日本央行为减少损失，将进一步调整收益率曲线，压缩长期利率的利差，这一措施又将影响地方银行信用金库的收益率，使日本的金融系统走入无力翻身的死胡同。

日本政府经济再生会议成员阿特金森指出，近20年来日本GDP总量变化不大，但财政对社保支出增加明显，致使政府支持经济发展的支出被压缩。西方国家对教育、基础设施、基础研究等发展型投资规模平均相当于GDP的24.4%，发展中国家平均为20%，但日本此类投资不足GDP的10%。因此从长期看削弱了日本经济发展的后劲。此外，日本劳动生产率低下也制约了经济发展。虽然近年来推迟退休年龄、鼓励妇女就业等提高了社会就业率，但日本劳动生产率未见提升。除汽车等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与西方国家持平外，日本的农业、服务业等生产率仅为西方国家的一半，日本经济规模世界第三，人口排名世界第11位，但劳动生产率仅列世界第28位。因此，如何有效利用财政手段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是最终解决经济发展和财政赤字问题的关键。

中欧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水到渠成

姚 铃 夏传信

中国和欧盟同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互为重要经贸伙伴。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是双方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也是双边合作的重要领域。中欧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上可以发挥协同效应。在双方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欧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将水到渠成。

中国和欧盟同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互为重要经贸伙伴。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是双方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也是双边合作的重要领域。同时，在气候变化不利影响日益显现、全球行动紧迫性持续上升的大背景下，中欧双方也有责任引领和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合力保护人类共同的家园。

10月31日至11月12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COP26)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过去5年，在《巴黎协定》设定目标的指引下，各经济体在政策层面采取积极措施应对气候变化，取得较大进展。截至2021年11月2日，《巴黎协定》全部193个缔约方根据协定要求，制定并提交了国家自主贡献(NDC)，包括137个经济体提交110份更新的国家自主贡献、14个经济体提交新的国家自主贡献。突出特点在于：一是明确了“本世纪中叶前后实现净零排放”的长期目标，如美国和欧盟提出2050年碳中和，中国承诺2060年碳中和；二是制定了2030年量化减排目标，如欧盟提出较1990年减排55%，美国提

出2030年减排50%至52%，中国明确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05年下降65%；三是各经济体应对气候变化，从偏重减排措施扩大至减排措施和适应性措施并重，如中国提出至2030年森林蓄积量较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

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格局由10个经济体主导，2018年合计排放量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65%。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作用下，绿色发展得到了主要经济体的高度重视，成为各自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能源消耗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四分之三之多(76%)，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最关键的领域。提升非化石能源在能源消耗中的比重成为各主要经济体应对气候变化的一项重要政策，如中国宣布2030年将非化石

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20国集团排放量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近80%，在更大的减排雄心及尽快付诸行动上具有特殊责任，包括：推动20国集团剩余成员提交净零排放目标，就净零排放期限形成共识；推动终止对化石燃料的补贴；推动多边或全球层面讨论和制定碳价格；推动多边机制为加快经济脱碳和淘汰煤炭创造金融和技术条件；融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将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提升至应对气候变化同等水平。以COP26和生物多样性昆明宣言为起点，推动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从目前的政治意愿共识转向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中欧可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推动20国集团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率先行动，力促2030年前实现全球排放减少45%。

应对气候变化到本世纪中叶要取得成效，除了需要主要经济体加大减排行动，还需要发达经济体帮助发展中经济体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尤其要给予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资金和技术援助。《巴黎协定》要求至2020年，发达经济体每年向发展中经济体提供1000亿美元应对气候变化援助。据经合组织报告，2019年发达经济体集体融资规模达到796亿美元，而2020年和2021年，因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全球经济衰退和优先推动疫情后经济复苏，发达经济体对发展中经济体的气候融资仍将会有所缺口。根据以往历史融资规模，以及基于发达经济体在今年6月G7峰会和9月联合国大会上的承诺，其如加快落实进程，2023年仍有望实现1000亿美元的气候融资目标。作为由发达国家组成的联盟，欧盟身体力行并推动更多发达经济体加入缩小融资差距行动，有助于帮助发展中经济体加快绿色转型并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而在昆明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上，中国宣布成立15亿元人民币的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是中国作为排放大国对履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担当，显示出中欧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上可以发挥协同效应。相信在双方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欧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将水到渠成。

(作者单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全球外企微观察发力

在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沃尔沃、福特、通用、戴姆勒旗下的梅赛德斯-奔驰、比亚迪和印度塔塔汽车旗下的捷豹路虎6家主要汽车制造商签署承诺：到2040年在全球范围内逐步停止燃油车的生产。

“零碳”“碳中和”“清洁能源”“节能减排”等成为本次大会的热词。由“零碳”引发的产业转型在汽车行业内表现得尤为突出，全球主要汽车制造商陆续为实现“脱碳”制定了长远规划。为打赢“脱碳”这场持久战，已有21家主要车企和零部件商公布了“脱碳”时间表。

全球主要汽车制造商均已行动起来，逐步淘汰包括油电混合汽车在内的所有使用化石燃料的汽车，并提高纯电动汽车的产量。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在柏林和美国奥斯汀市投入数十亿美元建造“超级工厂”，将大大提高其年产量。

另外，德国车企也在同步推进“脱碳”目标的实现。大众汽车宣布计划最早在2033年停止为欧洲车型生产汽油和柴油发动机，以加速向电动汽车发展，同时承诺到2030年将在电动汽车和电池领域投资超过1100亿美元，未来十年在欧洲、中国和北美推出数百万辆电动汽车。新加坡、瑞典等众多国家表示，将在2030年前禁止销售新型内燃机汽车。

据统计，全球汽车制造商计划在未来5到10年间，投资约5150亿美元，用于开发和生产新的电池动力汽车，逐渐摆脱内燃机汽车。

在全球碳中和浪潮下，绿色转型成为汽车制造商的必然选择。碳中和对于汽车行业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期待看到全球车企能按照其碳中和战略稳步推进转型，逐步实现碳减排，早日实现碳中和。



视频报道请翻阅第4版

据统计，全球汽车制造

商计划在未来5到10年

间，投资约5150亿美

元，用于开发和生产

新的电池动力汽车，逐

渐摆脱内燃机汽车。

在全球碳中和浪潮下，

绿色转型成为汽车制造

商的必然选择。碳中和

对于汽车行业来说，既

是机遇，也是挑战。我

们期待看到全球车企

能按照其碳中和战略

稳步推进转型，逐步实

现碳减排，早日实现碳

中和。